

新时代、新技术、新思维

——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华林甫主编，萧凌波 孙景超 刘新光 胡恒 孙宝秀 副主编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代、新技术、新思维：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华林甫主编. -- 济南：齐鲁书社，2020.6

ISBN 978-7-5333-4344-6

I. ①新… II. ①华… III. ①历史地理学—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86427号

责任编辑 周磊 曹新月 陈晓萱
装帧设计 郭颀 李生

新时代、新技术、新思维——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XINSHIDAI XINJISHU XINSIWEI 2018 NIAN ZHONGGUO LISHI
DIL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华林甫 主编

萧凌波 孙景超 刘新光 胡恒 张宝秀 副主编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编 250002

网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4

插页 6

字数 700千

版次 2020年6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4344-6

审图号 GS(2020)275号

定价 168.00元

序

吴松弟

每两年一次的历史地理全国大会,是历史地理学界的学术盛会。2018年8月11—12日,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承办、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协办的“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便是一次无论参加人数和学术水平都高于往届的学术盛会。

历史地理学由历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交叉形成。为了进一步推进学科交叉,2016年11月27日,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举办了“中国历史地理学重要成果汇报暨学科发展战略高层论坛”。去年的“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在学科交叉方面有了新进展,我们邀请历史学、地理学的领军级人物,或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或参加晚上召开的学术沙龙,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史地理学的领导或骨干,就如何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畅谈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阶段,这些讨论必定会推动历史地理学的新发展。

本次研讨会期间,主办方还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一层大厅布置了“中国历史地理学近十年成果展”,共有十八家历史地理学研究单位提供了介绍本单位研究状况与学术成就的易拉宝、图书等,展示全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单位的发展历程和学术贡献,会后这一展览又在首都一些单位继续展出。本次会议还采用开门办会的形式,请首都媒体记者参加会议,及时报道会议状况。以上的做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次的全国会议,体现了会议的主题词“新时代、新技术、新思维”。

11日上午的开幕式结束之后,中国史学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研究员,以《近代历史地理研究的任务刍议》为题作了特邀报告,指出历史地理学在现代地理学、历史学研究和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表达了对历史地理学大发展的殷切



期望。此后,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对李希霍芬《中国》中的中亚部分予以客观审视;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深入阐释了中国近代的“港口—腹地”网络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武汉大学徐少华教授运用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厘定了汉晋北朝陇县、清水县两县的行政建置与地理方位;陕西师范大学王社教教授通过对汉唐长安城的粮食和水源的分析,指出水资源不足将是“大西安”建设最大的限制性地理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华林甫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历史地图集编绘的传统与经验,呼吁学界大力开展历史地图集的研制编绘,并介绍了刚结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史地图集》的编绘思路、技术路线与未来设想。

在闭幕式前,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通过考察历代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政区设置,为当今关中城市群的行政区划改革提出建设性意见;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强调历史地理研究应该实事求是,夸大历史无助于文化自信;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以山西为例,认为中国古代乡村集市不存在市场等级高低,也不具备网络层级;陕西师范大学侯甬坚教授以澜沧江峡谷彩虹桥为个案,对桥梁与人地关系进行了环境史视角的研究尝试;暨南大学郭声波教授根据圈层结构理论指出“藩属国”等政治实体虽然享有高度自治权,但仍是宗主国国家疆域的组成部分;西南大学蓝勇教授提出环境的“改变”不等于环境的“破坏”,区域环境敏感度的天然差异决定了人类改变环境干涉限度的区域差异;复旦大学张伟然教授分析了当前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瓶颈,并指出历史地理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11日下午与12日上午,与会学者分为七个小组进行报告,主题包括历史时期的自然、政区、聚落、经济、人口、交通、军事、文化等传统领域,以及古地图与历史地图、边疆与域外地理、历史GIS小组等方面。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40篇,从中选出37篇原创论文,编成专题论文集予以出版。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近年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成果。

今天的地理现象,是以往不同时代发展演变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开大步的同时,各地的经济、文化、城市、区域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景象。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诸多方面的进展,摆在历史地理面前的研究课题不断增多,要求历史地理学者以“新时代、新技术、新思维”,对待新形成的历史地理问题。

依笔者之见,历史地理学对历史学的作用和贡献,主要是从空间角度和地理环境的角度,探讨国家统治、地方治理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地理学的作用和贡献,则主要是从较长的时间角度,看待短时间看不出来的环境演变和人地关系。在全球化加速进行的背景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空间已经超越国家的范围,在研究中国的同时,有必要进行外国历史地理的研究,研究时间可长可短,既可将古代、近代、现代融为一体,又可对一个有限的时间段进行仔细的研究。一旦面对学术,面对现实,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将学

术研究和现实应用相结合,历史地理学必将迎来新的大发展。本次会议结束了,而历史地理学新的任务、新的进展正不断产生,期待着历史地理学者群策群力,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持续发展。

2019年6月15日

(作者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目 录

| | |
|---------------------------------|--------------|
| 序 | 吴松弟(001) |
| 一、理论与方法 | |
| 近代历史地理研究的任务刍议 | |
| ——在 2018 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 张海鹏(001) |
| 史地田野考察的五大功能初探 | 蓝 勇(007) |
| 人力所通:澜沧江雾虹桥区域的环境史学认知 | 侯甬坚(025) |
| “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坎坷路 | 马保春(047) |
| 试论中国大陆地区历史地理学 1949 年前后研究范式的转变 | |
| ——从对侯仁之先生《“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 | |
| 一文的可能误读谈起 | 范今朝(067) |
| 历史药物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 陈隆文 代玄烨(098) |
| 二、历史政治地理 | |
| 汉晋北朝陇县、清水县建置与地望述考 | |
| ——兼论古秦邑的位置和唐宋清水县的治所变迁 | 徐少华(108) |
| 出土资料所见曾国疆域的分布及变迁 | 黄锦前(119) |
| 东魏肆州长城考察研究 | 赵 杰(130) |
| “务令边界宁谧”:康乾二帝的疆界治理观念与实践 | 王大文(141) |
| 光绪年间张之洞对琼、廉地区海防的经营 | 吴宏岐 王亚哲(153) |
| 北京“六郎庄”与“广安门”语源再探 | 孙冬虎(164) |
| 黄河变迁与历代河南地名变动 | 孙景超(172) |
| 清代“直隶”省级政区沿革考 | |
| ——《清史·地理志》直隶省叙 | 华林甫(182) |



三、历史聚落与人口地理

- 历史时期西安城市发展的限制性地理因素分析 王社教(201)
- 元末开封“五门”形成考论 吴朋飞(217)
- 明代晋东南乡村堡寨聚落的时空分布研究 郝文军(228)
- 水患与治所城市迁移的关系研究
——以道光初年陕西略阳县为中心 程 森(235)
- 楚先祖迁徙考论 尹弘兵(253)
- 20 世纪 30 年代东北地区人口密度分布的空间量化研究 丁绍通 韩宾娜(274)

四、历史社会文化地理

- 黄帝涿鹿故事与北京历史地理 史党社(285)
- 两汉时期任侠文化的地理分布初探 陈新海(291)
- 孙吴荆州的“王化”与“蛮化”析论
——从吴简所见“叛走”现象谈起 周能俊(305)
- 宋代以来浙江方志中龙王信仰的分布与特点 赵旭腾(315)
- 千佛寺塔院与万历皇嗣祈祷
——北京海淀花园路塔院地名探析 张 雨(337)
- 清代直隶地区著书者的地理分布探析
——以天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于双远(360)

五、历史自然地理

- 历史时期中国杨柳植物的分布 关传友(368)
- 明代中后期珠江中上游地区的灾害与社会治理 刘祥学(383)
- 乾隆年间河南省水旱灾害对粮价波动的影响 萧凌波(398)
- 1895—1940 年温州地区影响台风的识别
——兼论日记资料的可靠性 成赛男 郑微微(410)

六、地图研究

- “鸟道”辨析 刘新光(430)
- 明清之际的北洋海域与《登津山宁四镇海图》 孙靖国(434)
- BnF 所藏早期稀见中国城市地图述评 钟 翀(443)

有清一代未能改变的“天下观”

- 以《皇舆全览图》为视角 夏 帆(457)
- 从《校邠庐抗议》签注意见看晚清官员的地图观 胡 恒(468)
- 《清史地图集·湖北》图幅中的县界绘制及水域的政区界线研究 陈 冰(491)

关于历史地图集中附郭县相关标注的讨论

- 以《清史地图集》为例 朱 波(514)

附录:会议综述

新时代、新技术、新思维

- 2018 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逸才(524)

后 记 (533)

一、理论与方法

近代历史地理研究的任务刍议

——在 2018 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海鹏

讲三个问题。

一、《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编著缘起

《中国史稿》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主编的一套通史,全书共 4 册,于 1962 年出版。1973 年,郭沫若决定将《中国史稿》扩编为 10 册,历史所尹达负责古代史部分 7 册,近代史所刘大年负责近代史部分 3 册。1978 年郭沫若去世前,刘大年提出将近代史部分 3 册从《中国史稿》中独立出来,命名为《中国近代史稿》,获得郭沫若同意。原来设计《中国史稿》10 册历史地图,由历史所历史地理室陈可畏负责编绘。《中国近代史稿》独立后,历史所不愿意承担近代史部分历史地图编绘任务。《中国近代史稿》编写组把历史地图编绘任务交给了我。

我从 1964 年 8 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其间十余年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未曾参与科研工作。这时候要我承担历史地图编绘任务,我是饥不择食,就接了下来。当时我虽年近不惑,但在编写组内年龄最轻,我也无法推脱。其时,我对历史地图编绘没有任何概念。

既已接下任务,就要开始学习。我从近代史所图书馆找到中文的、日文的、英文的、俄文的若干种历史地图,反复研究与揣摩,就开始工作。在与地图出版社联系过程中得知,要出版《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就要处理近代中国边界问题。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下限是 1820 年,恰在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后中国边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正确处理边界变化,就不可能出版近代史地图。而处理近代边界,就要得到外交部批准。



没有外交部正式批准,近代史地图集是不能出版的。我的工作首先从近代中国边界摸起。我花了一年时间,研究了近代中国边界变化的经过,从近代史所找到清末和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可用的地图,反复研究,提出了近代边界处理的意见,经与地图出版社商量,请他们制作边界变化的样图。最后形成一份请示报告,对1840—1919年间近代边界提出了处理意见。这份请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地图出版社联合署名,送外交部审查。外交部很重视,经过条法司等各司局审查同意,由外交部在1980年某月发出正式回复(盖有带国徽的大红章),表示原则上同意近代边界处理意见。有了外交部的正式回复,我和地图出版社之间有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地图出版社对出版此图也充满了信心。

《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在1979年出版,下册在1990年出版,署名郭沫若主编;《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在1984年12月出版,署名张海鹏编绘。《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出版后,我受到了几位前辈的奖掖。一位是本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孙思白先生,另一位是谭其骧先生,他写来了一封长信,给予鼓励。中央民族学院郭毅生对我说,他让民院图书馆采购了150册。1987年6月9日,中华书局李侃以笔名柯安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书评《推荐〈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同年12月31日,红旗杂志编辑周溯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图文并茂说历史 丹青妙笔凝深情——推荐〈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的书评。这些都给予我很多鼓励。

大约在1981年,国务院批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局等单位的请示报告,决定组织力量编绘国家大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了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国家历史地图集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先生担任主编。我因为在做《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被近代史所推荐参加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工作。我记得,数年间,我参加过在北京、包头、浙江莫干山、北京怀柔召开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会议。我被任命为国家历史地图集近代战争、战役图组组长。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黄盛璋、文焕然、陈可畏、邹逸麟、魏嵩山等相识。

我在编绘中国近代历史地图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但对于历史地理学研究,我是一个门外汉。各位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我要向各位学习。

二、我对历史地理学的认识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既可以反映历史学的基本属性,也可以反映地理学的某些属性。学术界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有多种讨论,更多学者把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主办此次会议的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是中国地理学会下的二级学会说明了这个问题,也有人把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站在历史学

的立场上,我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功能是探索历史上的地理现象以及发生这些地理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我认为,不能只是把历史地理学看作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历史地理学,它只是传统沿革地理的发展和拓宽,它只是地理学的辅助学科,基本上属于应用学科;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方法,它属于基础学科。从研究方法上说,地理学研究主要依靠野外,依靠实验室,依靠科技手段,历史文献在其中不起主要作用。历史地理学主要依靠文献史料,野外考察是次要手段。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正式公布了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通过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编写的各学科概况、内涵、范围和培养目标。我在这里根据这本书分析一下中国史学科和地理学科在学科范围里如何处理历史地理学。

中国史的学科范围明确规定了7个学科方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专门史、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历史地理学。

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方向的介绍是:旨在系统研究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包括河流、湖泊、海岸、海洋、沙漠、地表、气候以及动植物的分布,自然灾害等),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包括历代疆域政区、人口、民族、城镇兴衰、交通变迁等),中国历史地图学(包括历史地图的研究和编绘),以及探讨人类和自然共同作用下的环境变迁等。

地理学的学科范围规定了6个学科方向: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环境与灾害地理学、地理环境遥感、城市与区域地理学。这里列出的6个学科方向,没有历史地理学的位置。其中,在人文地理学中的诸多内容中,只列举了历史文化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多少与历史有点关系。

中国史学科说明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的学者经过多次讨论、征求意见后编写定稿,并得到批准的。历史学科评议组,由钱乘旦、张海鹏牵头,组成学者共17人。同样,地理学科说明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理学科评议组的学者编写并定稿的,牵头的学者是李小文,成员共12人。

这个学科说明是国务院学位办发布的,2013年以来,是全国高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根据。

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地理学是中国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中国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地理学学科设置里,没有历史地理学的位置,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学科里顶多只是地理学的辅助学科。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今天是否还有历史地理研究室,我很茫然;据我所知,20世纪90年代,那里做历史地理的学者已经转向了。



三、近代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关于中国近代史,我们现在的约定,是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是中国现代史。笼统地说,历史地理研究向近代史时期转移,我建议最好包括中国现代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以往学者的研究眼光主要是朝着古代,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提出向近代转移,正是时候。当然这不是说,古代的历史地理研究就不做了,当然不是这样。

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学,与研究古代历史地理学比较,在我看来,学科属性是相同的,理论和方法大同小异。但是近代历史地理,至少有两大特点。一是近代、现代的中国,与世界各国有极其广泛的联系与交流,1949年前是被动的交流,1949年后是主动的交流(20世纪50—60年代与苏东各国的交流,也是主动的),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主动的交流。历史地理研究所关注的中国地理环境的变迁与这种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可以阅读的历史资料极其丰富,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还有丰富的历史档案,还有大量新闻报道,各种游记、日记、摄影作品,乃至电报、函件,等等。极而言之,几乎每个与地理环境变迁相关的研究题目,都可以找到资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外国人到中国各地考察,留下了许多记录。如有人溯长江而上,过宜昌,到重庆,为长江两岸留下了记录和照片。西北、西南、西藏、云南等偏僻之地,都有外国人考察的足迹。古代历史地理研究,在这一方面,是较为逊色的。

从研究方向的角度说,我在这里提几个题目,算是举例吧。

1. 从沿革地理的角度说,要研究从清代18个省的建制,到今天31个省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的形成过程。仅止于此,就是沿革地理。要超出这一点,就要研究在中外关系的交相影响下,在内部统治和管理的需要下,1884年新疆设省、1885年台湾设省,以及清朝末年西康设省的筹备,到民国时期更多设省的经过。

我讲一个在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时碰到的有关青海的故事。我记得,新中国成立后,民政部年年都要派员去青海协调四邻关系。20世纪80年代,民政部下决心解决青海界址问题,为此专门成立划界工作组,经过多年的工作,90年代初已妥善解决了青海四邻界址问题。国务院由此取得经验,决定由民政部负责组织全国各省的划界工作。其实,青海省界在历史上就是不清楚的。青海在1928年建省,建省以前西宁是甘肃的一个府,中央政府对青海的情况很不了解。民国初年,川边当局想把青海玉树地区划归四川。玉树一带藏族同胞反对,希望仍归甘肃,屡次上书甘肃省。甘肃和四川两省分别上书北京中央政府。玉树25族以囊谦为族长,囊谦一词在四川译为隆庆。四川给中央的报告称,隆庆应归四川;甘肃给中央的报告称,囊谦应归甘肃。中央政府根本不了解青海情

况,大笔一挥,把隆庆划归四川,囊谦划归甘肃。于是,四川和甘肃各据中央批复,陈兵玉树一带,边界纠纷变成了武装冲突。中央政府派员赴青海调查,了解民情,才知道所谓隆庆、囊谦、玉树实际就是一个地方,只是汉语译音不同而已。调查人员建议中央,按历史习惯,玉树仍应归甘肃管理为宜。这才使川甘两省的武装冲突得以消解。这个故事,是地学界的前辈张其昀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资源委员会组织的西北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中记录下来的。这个故事有一定代表性。

2. 与建省有关,近代边疆地理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国家版图上。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经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边疆危机遍于全国,东西南北,少有宁日。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蒙古问题、东北问题、东南海疆、西南陆疆,处处告警。160万平方公里领土被俄国占领。英占香港,日占台湾,葡占澳门。东北、蒙古成为俄国、日本的势力范围,山东成为德国(后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两广成为英法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其下游是东南海疆,其上游是西南陆疆)是英国势力范围。俄军占伊犁河谷达十年之久,且觊觎西藏;英国则乘日俄构兵东北而染指西藏。我们看到,影响中国现实政治、周边关系甚至国际关系的一系列边疆问题,几乎都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关,都与帝国主义侵略有关。近代边疆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军事战争问题,是一个中外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版图的变动,完全可以从地理环境变迁的角度切入,开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3. 与沿革地理相关,近代开放口岸(包括被动和主动),租界的形成,租借地的确立,各地领事馆的建立,都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地理信息,是开展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好课题。

4. 近代以来城市和交通的变化惊人,这是古代不能比的。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立马影响了两个城市的命运,一个是石家庄,从乡村变成城市;另一个是湖北的襄阳,从南北交通要道一下子变得萧条了。省会的变迁也是如此。河北省会、河南省会、安徽省会、广西省会等的变动,都与交通的改变有关。改革开放前,许多省会城市不过30—50万人口,今天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恐怕超过了200个。如何从地理环境的变迁中寻求答案,如何寻求现代化的需求推动地理环境变化的历史学解释,历史地理学研究可以回答很多问题。

5. 江河湖海的变化,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都很大。黄河入海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洞庭湖、鄱阳湖面积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湖北历史上号称千湖之省,现在只剩一半了。这些改变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如何,值得研究。1964年我曾到甘肃河西走廊张掖县参加“四清”运动。我住的村子旁边有一条黑河,发源于青海,流经张掖,流到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成为一片湖泊。90年代,由于黑河沿线地方拦截用水,居延海干涸了。居延海干涸导致每年四月西伯利亚大风刮起沙尘暴,猛烈袭击北京。2013年我曾到当年的住地看黑河,发现黑河已经改道了。黑河的治理结果使得居延海又有水了。这对于



减轻北京的沙尘暴有作用。黑河变迁的历史值得关注。

2015年我到江苏海门开会,市委宣传部一位同志带我到海门北面东灶港镇看海,这位同志以前在这里当过乡长。我看到辽阔无边的滩涂正在扩大。他告诉我,我们站的地方以前就是滩涂,不要几年,看不到边的滩涂就要变成陆地了。这位同志告诉我,滩涂以内的大片荒芜的杂草滩,以往曾遍布煮盐的灶,他当乡长的时候还有。我很感兴趣,想看看煮盐灶,但是已经找不到了。1965年,我曾经在今天天津开发区看到成片成片的盐田,许多盐工在那里劳作,盐山一座一座。前几年我再去这个地方,完全是一个现代化城市了。真是沧海桑田!盐是我国历史上,包括近代,很重要的物资,从天津经过长芦到海门的盐业生产线的变迁,很值得历史地理学者关注。

6. 当然还有一个变化不能忽视,这就是经济方式的变化。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惊人。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工业布局,到民国时期的工业布局,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工业布局,到大三线、小三线的建立,到1978年以后的工业布局,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近代经济地理,几乎有无限展开的余地。

至于人口的变化、教育设施的变化、医疗设施的变化,等等,都包含丰富的地理信息,值得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展开研究。

总之,近代历史地理学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天地是无限广阔的,是大有前途的。我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局外人,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是否有参考价值,请各位批评!耽误各位时间,谢谢各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史地田野考察的五大功能初探*

蓝 勇

所谓史学田野调查就是指通过户外踏察来展拓历史研究的领域,提高历史学研究的信度,扩大历史研究影响的过程。我们注意到,英语 Field 的早期语境是田野、原野、牧场,可能是相对 City 即城市、都市而言,而我们这里放大在科学考察这个角度,田野是指书斋以外的所有空间,即户外,包括城市和乡村。所以,我们这里的史学田野考察是指户外的一切观察、调查活动而言,而不仅仅是对乡村、山野的考察。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往往都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种理想境界来追寻,但在中国古代真正将野外考察与文本阅读很好结合起来的学者并不是太多,原因除了传统时代交通、通讯技术条件制约外,可能更多是并没有感受到田野考察在史学研究中的真正作用。同时,传统史学可能与现代史学在研究对象、方法手段、价值取向方面有较大差异,所以田野考察的重要性本身也是有较大差异的。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虽然我们都深知田野考察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我们公开的话语中不乏对田野考察的重视,但在现实功利化明显背景下真正愿意将大量时间、精力用在田野考察中的人并不是太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讲还是对田野考察的功用认识不足的原因。这里,笔者主要以自己历史地理研究的实践来对田野考察的作用作一分析。

现在归纳起来,史地田野考察的功用主要有印证传统史料(传世文献史料、文本记载的已知传说)、收集民间史料(非传世文献为主)、寻觅“景器场”佐证(佐证各类史料)、感知事物环境、诱发新的思考五个方面。显然,史地田野考察的功能决定了史地田野考察针对目标的广泛性,即一切人类本体(自然体和社会体)、社会现象(制度、文化、风土)、人文景观和器物、自然环境都是史地田野考察的目标。从时间断面上来看,人类学、社会

* 本文系重庆市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年度项目《史学田野考察理论与实践》(53204007771)的阶段性成果。



学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的是当下的情景,在历史人类学的背景下也多只能关注到明清时期的话语,就整体的史地田野考察来看,关注的时间可从人类产生以来的任何时间断面展开,当然也关注当下的情景,因为当下的任何情景都可能是历史时期的遗留或带有历史的轨迹和记忆。

一、让我们引证时信心更足的保障:印证传统史料

我们知道,史学研究的最重要资料支撑主要是传世文献,也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传统史料。在一般人看来,传世文献,特别是官修正史,往往信度较高,本身是一种可信标识,故往往对历史文献的记载深信不疑。但我们要知道,在传统时代与当下,史学著述作者的史德、史识在主观上都会在文献记载上形成误差,而在传统时代,由于交通通信技术、文本传承技术的局限性,客观上传世文献的信度会受到更大的影响。修正这种文献的误差、证明传世文献的可信度的途径很多,而通过田野实地考察来修正和证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途径。对于一些我们已知道或见于文本的传说,虽然它们不是传世文献,但也需要田野考察来佐证或辨误。

所以,田野考察的第一个重要功用就是通过观察遗留景观、场景来印证已经掌握的文献记载的精准性,分析记载与实景之间的差异,探索差异的原因,我们称为“对读”或“互证”。有的学者称为“解读文献”。具体讲就是通过田野考察发现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的人物、事件、制度的细化支撑材料来完成这种“对读”和“互证”。再具体划分就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传世文献有记载,但记载粗简宏大,细节不明,可信度不高,需要更多乡土的个案材料、环境、器物来“对读”“互证”,体现的是“细节证明主体”。第二种情形是传世文献的记载已经较为详尽仔细,需要更多乡土的环境、器物来“对读”“互证”其科学性,体现的是“图像证明文字”。

我们在研究中国南方皇木采办历史时通过田野考察发现了汉源县叶氏家族采办皇木的野史,与传统文献“对读”“互证”,复原了一个皇木采办过程的典型个案。历史文献中对于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的记载虽然比较分散,但通过检索可以发现许多史料,基本可以复原皇木采办的历史过程。^[1]后来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通过田野考察不断发现了大量有关皇木采办的碑刻^[2],进一步证明了皇木采办的采办过程和采办地点记载的准确性。但很长时间内,我们并没有发现具体的采木场及相关采木后人的记载,所以,我们对具体的采办过程的真实性与采办人情况并不了解。2008年,得到汉源县发现疑似皇木采办原木的消息后,我们在2008年和2010年先后两次对汉源县皇木镇杉树村进行了考察与试掘,证实了四根大原木的发现过程的真实性。同时,我们通过访谈叶氏家族,踏访叶氏家族墓碑,踏察水井沟附近环境,证明了叶氏家族采办皇木的真实可信。特别是通过

试掘,再次发掘出一根原木与以前发掘的原木互证,后又将考察获取的样本进行了同位素测年,证明三根原木的死亡时间为明末,一根为宋代,证明了皇木遗木与历史文献记载时间的吻合。同时,也发现了转运木材的具体运输线路,特别是对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找箱”“天梯”有了实证背景证明。^[3]可以说,正是通过一系列的田野考察和大量“对读”“互证”,我们对明代这段发生在野外大山中的事件有了较为全面和精准的认知,也证明了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

历史文献中有关明清时期的驿站位置较为精准,而汉唐时期深处西南地区山地的驿站虽然有名称记载,但位置往往并不清楚,所以,通过田野考察来定位就尤为必要。在唐宋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巴蜀地区有牛尾驿存在,但牛尾驿具体地点在哪里,唐宋元明时期并无明确的记载。以前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认为,它是在重庆市永川县(今永川区)的长江边的一个水驿。^[4]在1995年的中国唐史学会上,笔者提交的一篇文章提出牛尾驿应该是深处永川的一个陆驿,估计在永川太平镇与邮亭铺之间,但由于没有实地考察,并不能完全确定具体地点。^[5]到了2013年,我们组织了成渝东大路重庆段考察,从大比例尺地图上能够发现一个牛尾铺的小地名,即永川区耗子沟牛尾铺村的治地。但如果简单认为这就是唐宋牛尾驿的具体地址就错了,因后来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发现真正的牛尾铺在其更西面的老牛尾铺村,它才是唐代真正的牛尾驿地址^[6],这个差异不通过田野考察是完全不可能发现的。这个结论证明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唐代牛尾驿的客观存在,也证明它完全不是水驿,而是一个深丘中的陆驿,与严耕望先生估计的长江边的松溉镇附近相差六十多公里。这个案例实际上是一个通过田野考察来实现空间定位细化和纠误的过程。

清代滇铜转运中曾经使用过金沙江会泽小江口到叙州府河道船运,但金沙江河道新市镇以上滩多水急,自古视为绝险。怎样能在金沙江这段河道上航运,我们很长时间都将其视为历史之谜。我们发现很早之前邓少琴编的《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资料》中记载有用“滚干箱”“吊神船”的过滩方法转运滇铜^[7],但仅从文献记载上我们并不了解具体的方式和场景,虽然我们后来在乾隆《金沙江全图》中发现了这种场景描绘,但并不能完全理解这种过滩方式。后来我们对金沙江下游航道进行了系统考察后发现,至今还有一些地方存在这种过滩的遗迹,如屏山县冒水孔纤道,还明显存在这种“吊神船”的平台,可用于“滚干箱”的浅滩,沿江更是多有存在。^[8]这样,我们的田野考察证明了乾隆《金沙江全图》中描绘的不虚,也证明邓少琴先生记载之说的可信。遗憾的是,在我们对金沙江下游河道进行了系统考察后,由于向家坝、溪洛渡电站的修建,金沙江下游河道被完全渠化,相关历史遗迹已经永沉水底。好在我们已经通过田野考察完成了“互证”“对读”后的证明过程。

明清时期巴蜀地区战乱不断,留下的明清寨堡卡子众多,其中以今垫江县鹤游坪较